

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；
以人为鉴，可以明得失；
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。

关于清史『戏说』的最有力校正，
还清史真实面目，透析清朝的荣辱兴衰。

清史镜鉴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
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

部级领导干部 清史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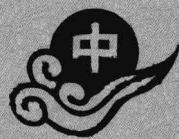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國家圖書館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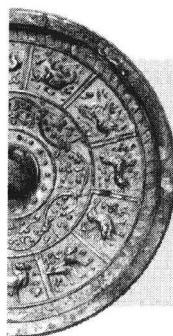
清史镜鉴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
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

部级领导干部
清史读本



國家圖書館



目录

CONTENTS

中 卷

社会生活

- ◆ 郭松义 清代的“农转非” (307)
- ◆ 郭松义 清代农业防灾抗灾的措施 (313)
- ◆ 江太新 清代灾情与救灾 (319)
- ◆ 左步青 “重农桑以足衣食”
 - 康雍乾三朝重视农业、关心民生琐谈 (325)
- ◆ 姜 涛 太平天国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探索 (331)
- ◆ 李 岚 清末“丁戊奇荒”
 - 一场夺去千万人生命的大旱灾 (337)
- ◆ 闵 杰 清末彩票的创始 (343)
- ◆ 闵 杰 清末彩票的泛滥 (349)

- ◆ 华林甫 清朝历史上的 8 级地震 (355)
- ◆ 赵云田 清代的地震灾害及政府的赈济 (361)
- ◆ 秦宝琦 清中叶五省白莲教起义及其社会后果 (367)
- ◆ 刘 平 杨 颖 “闯关东”:清代以来的东北移民 (373)
- ◆ 闵 杰 星期日公休制度的实行 (379)
- ◆ 朱 淳 晚清义赈的历史作用与意义 (385)
- ◆ 刘宗志 清代慈善机构的地域分布 (391)
- ◆ 王 林 清代的粥厂 (397)
- ◆ 朱 淳 清末东北鼠疫及政府的应对 (403)
- ◆ 朱 淳 辛亥风潮与长江大水 (409)
- ◆ 刘 平 柳亚平 清代的“走西口” (415)

思想文化

- ◆ 史革新 儒学书籍的编纂与清初文治 (423)
- ◆ 黄爱平 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与中国传统文化 (429)
- ◆ 黄爱平 《四库全书》的历史变迁 (435)
- ◆ 史革新 晚清“书厄”与江浙三阁 (441)
- ◆ 史革新 程朱理学与晚清“同治中兴” (447)
- ◆ 冯天瑜 晚清仁人志士的忧患意识 (453)
- ◆ 林永匡 清代饮茶、品茗趣闻 (457)

◆ 李帆	清代的书院教育	(463)
◆ 刘小萌	清朝对皇子的教育	(469)
◆ 李世愉	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	(475)
◆ 崔志海	清末美国退款兴学真相	(481)
◆ 王思治	清代文字狱	(487)
◆ 史革新	晚清西学东渐与新史学的发轫	(493)
◆ 李岚	《申报》：中国近代社会的“百科全书”	(499)
◆ 赵晨岭	《清史稿》及《清史稿校注》纂修的启示	(505)
◆ 林存阳	乾隆朝礼制中的政治文化取向	(511)
◆ 史革新	东学西渐的先行者	(517)
◆ 赵晨岭	《清史稿》仅成一稿的教训	(523)

人 物

◆ 史革新	努尔哈赤对汉文化的吸收	(531)
◆ 闻性真	努尔哈赤与明朝的人参商战	(537)
◆ 李文海	顺治帝论为官四戒	(543)
◆ 李尚英	从洪承畴说明清之际的“贰臣”	(549)
◆ 李文海	康熙帝八拒尊号	(555)
◆ 王思治	康熙重视督抚的选任	(561)
◆ 闻性真	康熙与清初历法之争	(567)

◆ 刘 潞	康熙皇帝与西洋科学	(573)
◆ 李国荣	雍正告诫百官：“做实在好官”	(579)
◆ 王俊义	清代廉吏于成龙	(585)
◆ 史革新	清初廉吏汤斌	(591)
◆ 冯佐哲	清代御史钱沣	(597)
◆ 潘振平	徐继畲和《瀛环志略》	(603)
◆ 王晓秋	黄遵宪及其著作《日本国志》	(609)
◆ 朱 英	“状元资本家”张謇的商海生涯	(615)
◆ 史革新	皇太极对汉文化的吸收	(621)
◆ 王冬青	郑成功与施琅交恶探析	(627)
◆ 李国荣	雍正：“说一丈不如行一尺”	(633)
◆ 吴伯娅	乾隆皇帝与西洋画家	(639)
◆ 王培华	唐鉴及其《畿辅水利备览》	(645)
◆ 李祖基	刘铭传与台湾近代化建设	(651)
◆ 张宏杰	曾国藩立誓“不靠做官发财”	(657)
◆ 戴 逸	光绪帝之死	(663)
◆ 陈 铮	维护华侨权益的总领事黄遵宪	(673)
◆ 吴伯娅	清朝唯一的汉族公主	(679)
◆ 赵云田	“香妃”其人与“香妃墓”释疑	(685)

清 史 镜 鉴 · 部 级 领 导 干 部 清 史 读 本

社会生活



郭松义

清代的“农转非”

作者简介

郭松义，1935年生，浙江上虞人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。主要著作有《伦理与生活——清代婚姻关系》、《中国屯垦史》等二十余部。



我国历史上,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,农民则是主要的生产者。所谓“农民安社会稳,农民困社会险”,着实显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。然而在当时,农民又是最大的弱势群体,每遇天灾人祸,最受冲击的往往就是农民,甚至被迫离开土地,成为流民、游民,从而加剧了时局的动荡。因此,历代有见识的统治者都把绥抚农民、疏导流民当作巩固、稳定统治的头等大事。自清代中叶起,流民一词又加入了新的内涵,即因人口急速增加,在传统农业地区人与地的矛盾加剧,导致农民离开故土另找谋生之路。有的学者根据家谱资料观察到,在147 941个男子中,离家外出的有18 691人,占其总人数的12.64%^①,说明农民外出闯天下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动向。然而这些外出者又不像以往各朝代的流民群,来势猛、冲击大,甚至还会演变成一个朝代的覆亡,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,并构成社会的一种常态。

农民持续离乡外出,主要是寻找土地,另外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改转其他行当。按照笔者对清“乾隆朝刑科题本”辑得1 101个人户资料,他们中除72人,约占6.54%状况不明,其余开地垦种或为人佃作和从事农业雇工的404人,占36.69%;也有人没有离开农村,但不再耕种土地,如做货郎等各种小买卖,还有打铁、木作等小手艺,以及投奔主家作仆婢的148人,占13.44%;另有104人,约占9.45%的人进入矿山开矿,或窑场烧窑、纸坊造纸等。在如许外迁人口中,值得注意的是,进入城镇求食的有373人,占33.88%。这中间,活跃于一般府州县城和地方市镇的279人,占25.34%。进入北京、苏州、汉口、广州、佛山等大城市的94人,占8.54%。虽然我们不能说,这份统计具有绝对的典型性,但至少说明农民在离乡谋生时,已有多种选择,并将城市列为重要的选项。

农民离开熟悉又挚爱的土地,进入城市,与清代市场经济的发展、城市数量



清代的“农转非”
郭松义

增加和功能的不断提升有密切的关系。江南名城苏州，清代系江苏藩司驻地，又有府署和三县衙（长洲、元和、吴），官役人数众多，但它更是个商业、手工业重镇，同时麇集着商号铺主、船董、手工业主，以及来自外乡农村的打工者。“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、太平、宁国人户，在苏无家室，总计约有两万余人”；在纸坊佣作的八百多名匠人悉为江宁、镇江人氏；而治坊工匠来自无锡、金匱等县；烛铺、烛匠多浙江绍兴人，板木匠作则由杭州、绍兴而来。有人还从消费的角度形容该城：“商贾云集，宴会无时，戏馆、酒馆凡数十处，每日演戏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”；又说：“如寺院、戏馆、游船、青楼、蟋蟀、鹌鹑等局，皆穷人之大养济院。”^②这其中的下等粗活，都是雇佣外乡进城农民来做的。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，“其间碓房匠作，以及坯行、画行、彩行、茭草行、柴行诸色人等，动以万计，率多别籍异民”^③。福建厦门自康熙中设关开港，船工大盛，“土木金银铜铁诸工率自外来”^④。广东佛山，清代是著名的工商业集镇，四方辐辏，其外来“附图占籍者几倍于土著”，诗称“舟车云集此天涯，半是侨居半故家”^⑤。浙江杭州，早在康熙末，已有人说该城百姓“流寓多于土著”^⑥。又如湖南省城长沙，谈不上是个著名工商城市，可“佣工担夫率皆邻县远省仰食其间”^⑦。在这众多的外来侨居者中，多数也原是农民。有关此类情况，在广州、汉口、重庆、天津等城市无不如此。

北京是京师，居住于此的除登录于宛平、大兴户口册籍的在城居住的普通百姓外，还有皇室亲贵、大小官员、吏役、拱卫京师的八旗劲旅以及他们的家口。在人口比例上，后者远高于前者，是个十足的政治型消费城市。城市既要消费，就要有人为其服务，于是周边农民纷纷进入，到清代中叶，估计人数约在二三十万之间，已是一支不小的队伍。据笔者由档



从事着各种职业的进城农民



案辑得的1756个外来人口样本显示：他们中原籍属于直隶(今河北)的占61.22%，涉及全区85个州县；其次来自山东，占21.07%，涉及62个州县；再次是山西，占8.08%，有29个州县；余下分别来自河南、奉天(今辽宁)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等11个省份。这些外来者进入北京，多数从事出卖苦力的活，像为人佣作、赶车、抬轿、挑煤、看井送水、背粪、掏沟填土，也有充当作坊工匠、学徒和以手艺为生，如做酱、琢玉、理发、裁缝等。从事商业活动的也为数不少，不过多数是些店伙和学徒，或是推车、挑担的小贩。地位最低的是卖身为奴者，还有通过自净投靠于王公府第的太监。在进京者中，多数是只身单个，也不乏携带妻儿家口的。亦有被拐带的单身年轻女子，以及丈夫去世，或因家用不继需要外出揽活的妇女。她们多为人佣仆，或洗衣缝补，也有被卖作婢妾、沦落成为娼妓的。

北京的外来人群，在从事职业时，常常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，像看井送水多由山东胶东来者。北京竹枝词中有“山东人若无生意，除是京师井尽干”，便是指此。京师每年要接受由南方各省运来的大批漕粮，然后砻筛加工，其“碓房多山东人”^⑧。山西人富者为掌柜老板，贫者作店伙、跟班学徒，以从商为主；直隶进京人數最多，其从事行当也更繁杂。总之，北京需要什么，便会出现这些人的身影，而且干的都是最脏最累，官爷、八旗子弟和在城居民不愿做不屑过问的活。可以说，是他们打理了北京城的吃喝拉撒，推动着北京日常生活的运转。可就是这样一批与北京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外来人群，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。首先，他们不属于北京在籍者，除少数随铺号店主登录入册的伙计、学徒，或价卖、投靠于主家的仆婢、雇工，均归隶原籍，一旦出现事端，就得遭到遣返；其次，他们不但工作条件差，生活也十分糟糕，就以栖身居所而言，除仆役、受雇者固然能暂住于主人家或店房、工坊、货栈外，更多的人只得借住城边和城郊土屋，甚至有歇居寺庙及门洞墙沿者；再有，随着清代后期农村生产状况的恶化，进城农民不断增多，可城市化的程度又不足以容纳更多的农民，造成失业游民增多，有的竟因贫困交加陈尸街头。根据笔者对清代北京394宗自杀事例的调查，以外来者所占比例最高。究其自杀原因，多数是因失业、生活难过。一方面是城市的发展需要这些外来农民，而且他们愈来愈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仰赖者；可另一方面，他们的劳动付出与所获却大不相称，属于城市中的边缘群体。其实离乡进城农民的此种境遇，不只



| 清代的“农转非” |
郭松义

限于北京，在其他城市中也大体相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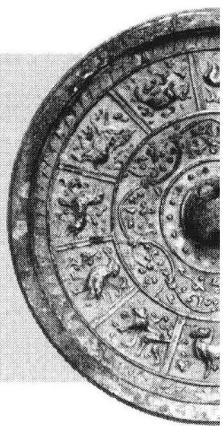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农民的身份也是在变化的。因此，考察历史上的农民，不能只凝注附着土地的劳动者，对于那些离乡离土的、特别是进城农民的工作和生活，理应纳入研究者的视野。实际上，明清以来城镇的蓬勃发展，已使农民无法置身于局外，至于他们进城后的角色转换，真正融入城市，那就牵涉到国家政策、社会接纳程度和他们的思想认同等多个方面，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。

注释

- ①刘翠溶：《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》，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经济研究所1992年版，第254页。
- ②(清)钱泳：《履园丛话》，中华书局1979年版，第26页。
- ③凌涛：《江西视臬纪事》卷四，《禁窑厂滋事》。
- ④道光《厦门志》卷一五。
- ⑤民国《佛山忠义乡志》卷一五。
- ⑥康熙《钱塘县志》卷六。
- ⑦乾隆《长沙县志》卷一四。
- ⑧李光庭：《乡言解颐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07页。

郭松义

清代农业 防灾抗灾的措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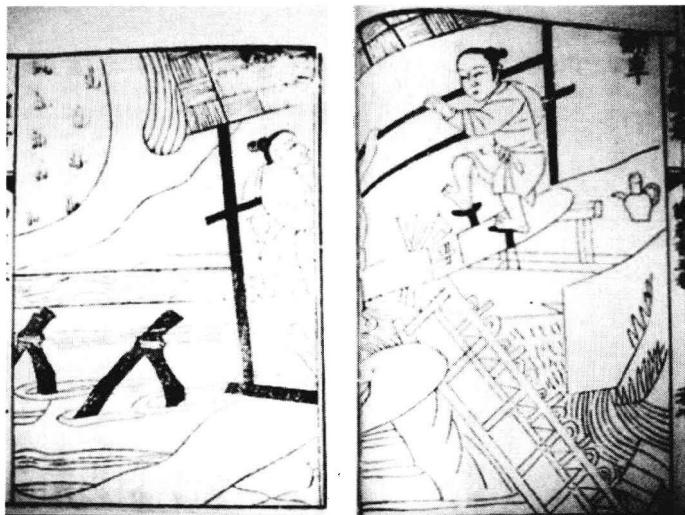


作者简介

郭松义，1935年生，浙江上虞人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。主要著作有《伦理与生活——清代婚姻关系》、《中国屯垦史》等二十余部。

清代是一个灾害频发的朝代。根据《清实录》记载：在有清268年中，共发生水旱风雹雪、虫蝗、地震等灾害6253次，平均年发生率23次强。如以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为划界线，此前177年有灾记录3371次，年均约19次；之后91年2882次，年均达32次，后者比前者年均多出近13次，这说明灾害是在不断地递增^①。为了抵御灾害，减少农业损失，在清代，从朝廷、地方官府、士绅到直接从事生产的农民，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。尤其是对灾害感受最深的农民，在抵御和消除灾荒中，起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；他们积极防灾抗灾的诸多举措，值得后人认真总结。

一、兴修农田水利



袁黄《劝农书》中水利图

北方主要是大力挖掘水井，南方则是在山区修筑梯田和中小水利工程。北方少雨，开挖水井，平时可用于灌溉，灾年则有利于抗旱。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，晋陕两省连遭大旱，晋东南和蒲州府辖下州县以及陕西富平、蒲城等县，因汲井灌田，使百姓少受颠沛流离之苦。正如有



人所说：“水旱二者，旱之害尤甚……而园蔬烟地不虞旱者，以有井也”；又说家开有井，“虽有旱岁，不至流离”^②。此后，直隶、山西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等北方省区更注意开凿水井。有学者统计，乾隆时，该地区已有大小灌井六七十万眼，这对抗灾防灾起到不小的作用。南方多雨卑湿，人们因地制宜，以修筑陂塘渠堰防灾。清人不但认识到水和田的关系，而且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了水和田的比例，譬如十与一、十与二三和十与五等，即10亩水田需配置1亩或两亩至5亩水塘，平时防涝蓄水，少雨时节溉田抗旱，兼能养鱼虾、植茭苇取利，一举数得。其实在水利兴筑中，最能体现清代特点的是山区小型排灌体系的建设。这与雍乾以后大批农民进山垦荒有密切的关系。山区环境艰苦、交通闭塞，生产条件较平原传统农业地区要落后得多。人们进入山区后，若要长期生活下去，必须改变种田靠天吃饭的格局，加大在水利上的投入，使旱得以灌、涝有所蓄。“御旱之术，高下凿塘浚沟，或高山数十里引泉分灌，或平原溪涧设陂瀦水洒之”^③；亦有“大展陂岸，使广而多受，虽亢旱之年，不至耗涸。从高泻下，均资广及，沾润一番，可以经月，虽有凶灾，不能及矣”^④。这样的水利工程，在浙闽赣楚湘粤川陕的山地丘陵，几乎在在可见，尽管受益者多数面积不大，广者溉田千亩、数百亩，少的不过百来亩、几十甚至十几亩。不过因为它们广而且众，集腋成裘，作用就不可小觑了。

二、开展多熟种植，扩大多种经营

清代的农业种植，除了关外东北、塞北、西北等地采用一年一收，其余像华北的大部分土地，已实行两年三熟，南方则有一年两熟和一年三熟制。开展多熟种植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增产多收，当灾害袭来的时候，可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因一季绝收、歉收所造成的困难。因为夏收遭灾，还可指望秋收和来年的春花。在很多情况下，大水一过，若季节来得及，还可赶播补种早熟作物以弥补损失。至于农业中的多种经营，也就是一家农户在种田以外，往往要饲养家禽或猪、羊之类的家畜，用池塘或拦河养鱼，有的在房前屋后种树，南方可能还有小片竹林，妇女或男子在农忙之余，从事纺织和各种竹木草编。这样的多种经营，对于抗灾减灾也有积